

旅居海外经济学者力作

劳动经济制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a System of
Laboral Economy

一种劳动企业雇用国有资本的市场经济

A Market Economy in Which Collective Labor Hires State-Owned Capital

刘恒中 著

Hengzhong Liu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旅居海外经济学者力作

劳动经济制度导论

一种劳动企业雇用国有资本的市场经济

刘恒中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劳动经济制度导论：一种劳动企业雇用国有资本的市场经济
/刘恒中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9

旅居海外经济学者力作

ISBN 7-5005-5974-7

I. 劳… II. 刘… III. 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经济-经济
制度-研究 IV. F24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8371 号

旅居海外经济学者力作

劳动经济制度导论

一种劳动企业雇用国有资本的市场经济

刘恒中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URL: <http://www.cfeph.com.cn>

E-mail: cfeph@ce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8.875 印张 446 000 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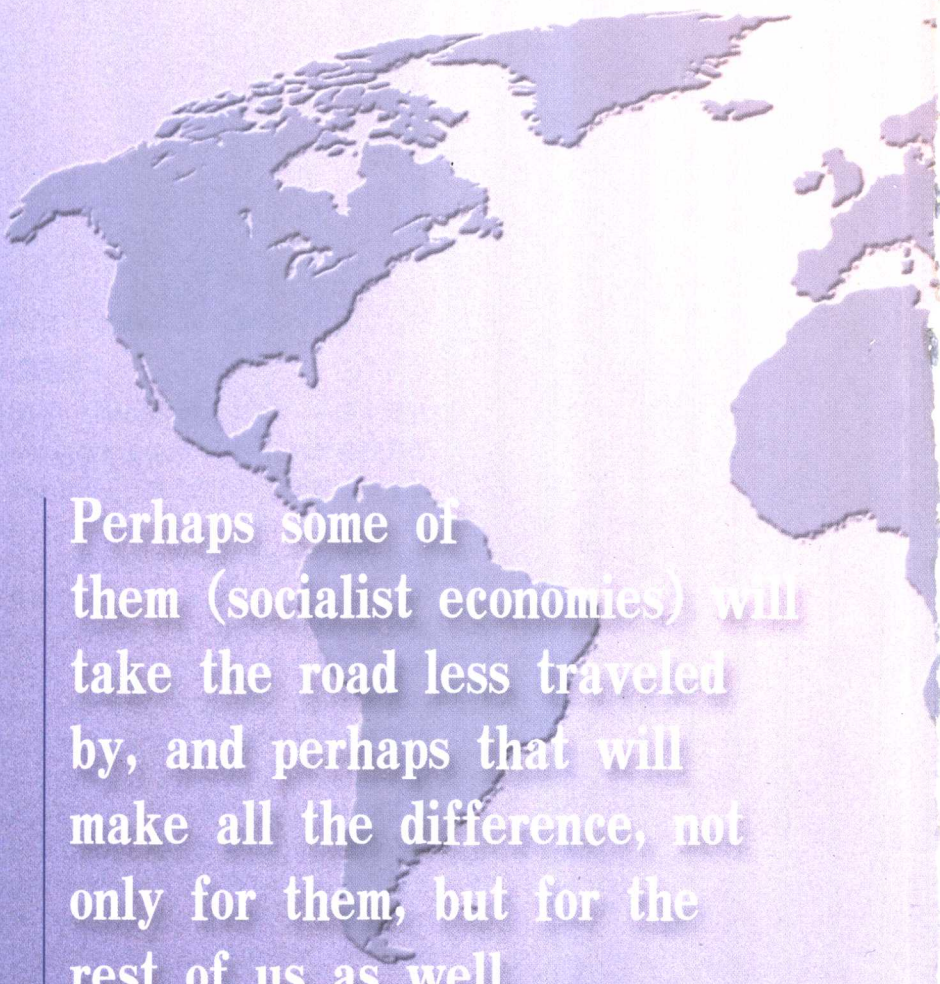
ISBN 7-5005-5974-7/F·5241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刘恒中 (Hengzhong Liu), 中国中南财经大学经济专业哲学学士、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管理硕士、美国纽约市大研究生院金融专业经济学博士, 以企管实践、银行金融、经济理论与数据技术之综合见长。现为花旗银行集团花旗信用卡公司 (Citi Cards of Citigroup) 副总裁, 历任信用卡客户征集决策管理部、策略发展部等部门的主管, 领导制定包括对象选择、市场策略、信用条款与利率价格等有关信贷客户征集与管理的各种决策及经营战略。兼任中国武汉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曾任教于美国新泽西理工大学。曾任职于纽约市大的政府与工商研究中心和美国 AT&T 公司。曾在国外经济、金融学术会议上和国内外中英文刊物上发表过很多金融与经济学论文, 独立地建立或领导建立、实施过很多经济、金融市场、市场策略优化、金融工程、风险管理及公司预算评估等方面的理论模型与实用模型。二十年不懈的研究形成本书“国家所有资本+工人所有企业”的市场经济模式与“劳动雇用国资”的经济理论。



Perhaps some of
them (socialist economies) will
take the road less traveled
by, and perhaps that will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not
only for them, but for the
rest of us as well.

Joseph Stiglitz
in " Whither Socialism? "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 鲁迅：《故乡》



出版说明

旅美经济学者刘恒中先生五易其稿、历时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劳动经济制度导论》，旨在探索一种比当代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根据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见2002年7月1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我们出版这部学术著作，也是为了引起经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以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年7月23日

自序

这本书，自大学年代开始，我五易其稿，写了近二十年。

那时改革伊始，实践呼唤新的经济理论。而我们所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基本内容，多为时事政策的解释与宣传，很难看成一门经济科学。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无论正确与否，是一幢系统的、结构完整的理论大厦，则那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多不过一堆掺杂着些许闪光金矿的散沙或砖块。

起初几年的冥思苦想，皆不得要领。一天偶尔读到于光远教授的《社会主义下的 C、V、M》一文，颇受启发。尽管我并不同意该文的许多观点，但它使我开始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下的 C、V、M。这，其实就是本书的发端。

当时的思考，主要以《资本论》为模本。一般认为，三册《资本论》所揭示的，分别是资本的生产、资本的流通和资本的再生产，或曰剩余价值或资本利润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资本利润的市场实现及剩余价值或资本利润的分配即再生产。整个的分析皆以资本产品的价值构成即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划分为基础，或者说以资本商品的价格构成即所费资本、工资成本与资本利润的划分为基础。整部《资本论》无非是在讨论资本企业之生产目的怎样不断地扩大实现。价值或价格构成明确地规范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手段、成本与目的，遂使整个《资本论》成为有机的逻辑整体。根据这种认识，我当时琢磨的问题是：什么是

社会主义下的产品价值构成？或者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手段、成本和目的？我甚至乐观地估计，只要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就不难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直接援引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表述，这就是“满足全体国民不断增长的物资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不能用“劳动收入”这个范畴，因为担心导致重个人消费、轻国资积累之倾向的可能。也不能用“国资利润”这个范畴，因为这样会颠倒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这一表达，既无明确的质的定义，也无严格的量的规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正确的政治术语，绝非如“剩余价值”、“资本利润”等一般严格的经济学范畴。相联系地，《资本论》关于资本商品价值构成的划分，被毫无迟疑地沿用在社会主义产品的价值构成上。对此，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种版本相互抄袭着同一个著名的解释：“虽然量的划分相同，但质的涵义却不一样”。我至今仍然无法明了，所费资本、工资成本与资本利润的价格构成划分，如何同劳动者当家作主这个信仰联系起来？如何同“满足全体国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个生产目的联系起来？

从这里开始，我做了自己所谓的“逆向思考”。资本与劳动乃两种最根本的经济资源。在资本主义下，资本从而资本所有者占统治地位，自然地，劳动工资属于成本范畴，资本利润属于目的范畴。生产目的系资本利润的极大化，劳动工资率的平均化乃资本利润平均化的前提。那么，反过来，根据社会主义原理，劳动从而劳动者占统治地位，顺理成章地，劳动收入属于目的范畴，资本利润属于成本范畴。生产目的变成劳动收入的极大化，资本收益平均化乃劳动收入平均化的前提。根据这种认识，我把

社会主义下的价值构成划分成所费资本、平均资本收益和平均劳动收入等三部分，其中，劳动收入为生产目的。

这其实就是本书第一个未完书稿的基本内容。那是1980年初，我进入大学三年级。虽然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这类思想仍近乎异端邪说。这个稿本，没有涉及任何经济改革问题，完全谈不上与当时经济改革实践的直接联系。在研究方法上，许多当时能读到的中文版的西方哲学著作及其方法论，尤其是黑格尔的逻辑推演和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令我印象深刻，下意识地极力模仿。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规定为：从生产资料国有与劳动力私有这个对立统一的前提出发来推演出一个经济体系，进而揭示这个经济体系的主要特点和规律。这种完全无视现实经济生活的研究方法，可能是我二十多年来一直无法把自己的研究所得推向经济各界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受《资本论》的影响，该书稿采用徐禾等所著《政治经济学概论》的结构，把重点放在劳动收入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积累规律及社会主义的生产价格构成等几个方面。

我曾经将这第一个未完书稿分成若干论文向几家杂志社投稿，结果仅一篇文章惠蒙《学习与探索》刊登在其内部版上，题为《消费基金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用消费基金而没用劳动收入这个概念，是一个小小的技术处理，以减少鼓吹个人收入极大化的嫌疑，增加被接受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消费基金可以理解成国民收入中的部分，主张个人收入极大化的意思不那么浓厚。

在第二个未完书稿中，劳动收入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资本收益平均化乃劳动收入平均化的前提这个理念，被用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主导方向，探讨新的、基于且仅基于资金国有和劳力私有这个所有结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学习与探索》的

吴荣柞先生，与我素昧平生，为要出版这个稿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该杂志社最终未能全文发表这个书稿，仅选其中一章，做了很大修改后，以《试论国有资金的有偿占用模式》为题发表。当时，改革的主流议题是“企业利润留成”、“放权让利”、“财税包干”，自然没有人会留意一个布衣小生的反调。

动手写第三个未完书稿，是我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与写第二个书稿的间隔，计有近十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尽管无时无刻不在思索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我终究没有能拿起笔来。原因之一在于，奔命于学习与谋生之间，几乎找不出比较整块的空闲。更重要地，受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系统教育和强烈冲击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沉溺于复杂的数理推导、统计计量和实证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禁锢于博大精深的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系统之中，强烈地质疑自己过去所做社会主义研究的科学基础与理论前提。尤其苏、东事件后的几年里，我不得不尽量地搜集各个方面的资料，据此对自己所持社会主义观念做一次又一次的全面检讨。然而，多年的思索徘徊，对以劳动收入为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我更加充满理论上的信心。这时，我才着手第三稿的构思与书写。该稿没有多少新的进取，只是在用“平均国资雇用利率”原理批评流行的国资股份制等方面下了一些功夫。

当年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体制，犯了让工人集体自治国有企业或“社会所有企业”这个根本性的错误，最终遭致合乎逻辑的必然惨败。这个事实，在西方资本主义全面展示其辉煌的今天，使绝大多数社会主义改革者或“终结者”把“精英”资本主义奉若神明，几乎没有人再来思考是否还存在另外一条更能实现“产权清晰、政企分开”的市场经济道路。例如，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依据资本雇用劳动和精英管理的习惯性思

路，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使之成为由精英代政府管理的、按国资股份向政府分红的、以资本利润为目的的多极多式股份企业。然而，我却倡导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取向：依据劳动雇用资本和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反向思维，力荐把企业的国家所有变成工人所有，使之成为由工人自己管理的、按平均利率支付国资利息的、以劳动收入为目的的劳动者企业，从而建立一个以这种劳动企业为核心的市场经济。

大约从1993年起，因为转入工商界谋生，不再需要只抱着西方主流经济学，我开始大量接触、阅读西方经济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尤其关于劳动者管理企业的研究。最著名的，如瓦尔德（B.N.Ward）教授1958年和诺贝尔奖得主米德（J.E.Meade）教授1972年写的关于劳动者企业的论文，康奈尔大学瓦尼克（Jaroslav Vanek）教授在1970发表的《劳动者管理的市场经济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Labor - Managed Market Economies）》一书。这些研究，尽管绝大多数都做得很深，普遍采用了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和数理方法，可他们不是在资本私有制的前提下讨论劳动者管理企业，就是在企业国有的前提下讨论工人自治。得到的结论，或者资本雇用劳动乃经济自然选择之必然，或者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之间转圈子。在南斯拉夫瓦解后的1992年，瓦尼克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从中央计划到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的文章。在这篇痛定思痛的自我反思中，他提出了一些我1983年在《学习与探索》的文章中发表的观点。然而，即使如此，他仍然未能认识到货币形态的资本国有制，未能认识到劳动者所有企业并雇用国资乃资本国有制市场经济的本质。

第四个未完稿紧接在第三稿之后。由其中若干章节组成的两篇稿子，承蒙《经济研究》刊用。在这个稿本中，我清楚地认识

到社会主义经济不等于国有企业经济。这是一个令我引以为自豪的、认识上的飞跃。我明确地理解到，资本的货币形态的国有、把使用国资之企业的所有权交给劳动者自己以及劳动雇用国资，乃我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本质。只有用这些新观念代替“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国有、企业国有和国资雇用劳动”的国有企业经济观念，我们才能彻底地走出斯大林模式，才能找到比当代资本主义更优越的国有资本制市场经济。

然而，我仍不怎么满意第四稿。因为在这个稿本中，仍然有两个关键的问题没有探讨到令我比较满意的程度。一是新旧劳动成员的进出问题，一个劳动者企业如何能无限地延续下去呢？“劳动成员权利”和“劳动成员权价格”这两个范畴的引入解决了这个涉及劳动者市场的问题。二是在劳动雇用国资制度下，如何将国资配置给各个具体的企业。当然应该通过市场，但是如何通过市场呢？倘无一个合理有效的通过市场配置国资于具体企业的机制，劳动雇用国资制度就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可行的。这个难题让我徘徊了好几年，不敢继续朝既定的方向研究下去。终于，我找到了“通过国民的‘市场投票’达成国资之企业配置的优化”这个机制，当时简直让我欣喜若狂。于是，我动手写成现在读者面前的第五稿。期间，以政企分开为题的两篇文章，承蒙《改革》杂志分别发表在其2000年和2001年的元月号上。

如果一场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仅以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最高楷模，仅以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具有效率为满足，还不如直接地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这样，像东欧一样，从事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研究的任务，非常明确，即如何把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转变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这里，没有新理论的探索，只有按图施工的困难和应用现成理论、模仿现成实践的麻烦。但是，基于自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

方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基于自己在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美国分别十多年的亲身经历，我坚信一定存在一个比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优越的资本国有制市场经济体系。这种坚信驱使我耗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用普通常识（common sense）和经济逻辑（economic logic）来寻找真正优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我从小沐浴马克思主义教育，且立下宏愿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本书中，我继承了马克思许多基本分析方法。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构思，我显然同传统观念走得很远。我抛弃了国有企业及其经济，主张资本国有制下的劳动者企业及其经济。这，或许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叛逆，也或许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

我也学习和研究了近二十年的当代西方经济理论，而且已经积攒了很多年在金融资本企业、电信资本企业的工作实践与管理经验。用严密数学公式与逻辑推导的当代西方主流理论来直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并理直气壮、顺应潮流地介绍给国人，应该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知道，在当代资本经济范畴的框架内，从随机微分方程中，绝对推导不出当代资本经济制度以外的任何经济体系。生活在作为资本主义榜样的国度，立业于典型的金融资本企业，却在疲于谋生之余，为寻找与资本主义相反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呕心沥血。这，或者系顽固不化的乌托邦幻想作怪，或者乃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及其理论的一种更高境界的超然认知。

我在美国的朋友们几乎普遍相信，无论如何，中国业已走上资本主义的不归路。脱去社会主义外衣，不过是迟早的事。所以，研究社会主义的问题尤其在美国研究社会主义的问题，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虽然不看好我这研究的意义，但总是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尽快完成自己半辈子的心愿。在

此，我要衷心地感谢这些好心的朋友们。

尤其是《中国企业报》的记者佟铁峰先生，坚持不懈地宣传“资本国有+劳动企业”的市场经济，不断地鼓励我完成后期的研究。还有我2001年找到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财经出版中心主任袁中良编审，没有他的赏识和帮助，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这里，我要对他们致以特别的谢意！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童年好友胡兴松先生的帮助。

最难能可贵的是我的妻子吕玲。虽然她一直希望我以自己的数理统计、数据技术和经济理论等知识特长做一些合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但在偶尔的“吃饱了撑着”的责备背后，她却最忠实地、始终如一地支持着我不断地继续这很难带来学术成就和经济效果的研究。我的两个孩子——子若和子莊，他们的成长本身就是对我努力工作的鼓励。我要对他们说声抱歉。除了谋生外，进展缓慢且成就不彰的研究，花去了我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我能给他们的时间太少，更不用说带他们出去度假和旅行。感谢我的父母和小孩儿们的大姨，他们近些年来分别帮我们料理家务，让我能把所有的业余时间投入这本书的写作。总之，我这本书的完成，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妻子的理解与支持以及孩子们给我的力量。

数年前，在给国内一位好友的春节贺卡上，我写了类似下面的话。世界之大，竟无我立足之地。我之主张，在西方，被一些人视为不受欢迎的共产主义宗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真诚拥护者们弃之如取消社会主义的邪说，西方资本主义的真诚拥护者们或一些西方经济学的饱学之士，则视之为不识时务、欠缺实证理论的臆想。

有个颇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说过一句话，“最愚蠢的经济学家是研究不存在的东西的经济学家”。我想，我大概是最愚蠢的

经济学人了。不过，我总记得中学课本上鲁迅先生在《故乡》里的议论，“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顾影自怜之余，想起了曹雪芹《红楼梦》序言中的自叹自怜之词：“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里擅自改动几字，抄录如下，聊以自慰，也作为此序的结语，企望曹公不会过于在意我这拙劣的抄袭。

满纸荒唐话，
一腔心血费。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刘恒中 (Heng zhong Liu)

1999 年第四稿、2002 年 6 月第五稿

写于美国新泽西州秀特尔山庄

(Short Hills, New Jersey, USA)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篇 经济基础——集体劳动雇用国有资本	(15)
第一章 劳动力私有与资本金国有	(17)
§ 1.1 劳动力私人所有制	(18)
§ 1.2 资本金国家所有制	(25)
§ 1.3 劳动力私有与资本金国有的对立统一	(34)
第二章 国有企业经济模式：国有资本雇用工人 劳动	(44)
§ 2.1 国有企业经济体制的沿革	(45)
§ 2.2 国有企业经济及其观念	(53)
§ 2.3 国有企业经济及其观念的终结	(65)
第三章 劳动企业经济制度：工人劳动雇用国有 资本	(79)
§ 3.1 若干有关经营私有性与资本国有性的经 济关系	(80)
§ 3.2 劳动雇用国资的市场经济制度	(96)
§ 3.3 劳动者企业经济或劳动经济及其观念的 本质	(106)